

目 录

张文彬同志四十周年祭 左洪涛 (1)

张发奎将军关心家乡的二、三事

..... 墨 川 (12)

一个长期与我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

——英雄先生史略

..... 陈 遂 (17)

我所认识的陈维廉同志 李子明 (22)

关于抗战时期《北江日报》出版情况

——《张文彬同志四十周年祭》读后的回忆

..... 潘允中 (27)

抗日战争时期韶关《晨报》经历掠影

..... 梁若尘 (33)

在复杂环境中前进

——忆抗战期间韶关戏剧界的统战工作

..... 李 门 (38)

为我党服务的“义和店”和“昌兴公

司” 李学林 (48)

乐昌永和商号交通联络站纪实

.....朱上炯 (57)

回忆英德“良友书店”.....莫三球 (64)

翁源创建翁大公路概况

.....谢其民、许保东 (68)

韶关火柴行业简史.....毛新河 (72)

抗战时期的韶关饮食业.....硕农 (77)

“联总中国广东分署粤北车队”的始末

.....梁宗奇 (80)

记别传禅寺本焕和尚.....邓玉贵 (83)

战时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简述

.....苏汉忠 (89)

战斗友谊的歌声

——记抗战时中苏友协广东分会一次小联欢

.....萧羊 (91)

马坝一夕

——韶关陷敌前“逃难”散记

.....怵之 (94)

韩愈《远览》石刻手迹.....矜庐 (99)

读者·作者·编者

有关丹霞的地形问题.....饶纪仁 (100)

张文彬同志四十周年祭

左洪涛

编者按：作者现任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本文原载1984年8月27日《羊城晚报》，因文内记叙的是当年韶关的一些情况，很有史料价值，现征得作者同意，并作了一些补充，登载本刊。

抗战期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监禁、酷刑、折磨，活活整死，至今四十周年了。

一九三九年元旦，我和刘田夫、杨应彬、何家槐、张敬仁、孙慎、麦新、黄河天、郑黎亚、沈振黄等十八个同志所属中共特别支部由湖南平江转移到广东韶关时，曾在文彬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一年。他那崇高的革命品德、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至今犹牢牢地铭记

在我的心里。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正当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成之际，郭沫若同志根据上海东战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要求，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会同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为张所属第八集团军组成一个类似北伐军政治部那样的政治工作机构——战地服务队。该队设总务科、宣传科、外务科（实即组织科），同时成立一个地下党组织——特别支部，钱亦石同志任队长，主管全面工作，杜国庠、石凌鹤同志分别担任总务科、宣传科科长，主管行政、宣教工作，我则担任外务科长和特支书记，主管党内的组织动员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战地服务队随同张发奎到达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通知我们到长江局召开支部大会。由于当时我们对长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理解不深，有的同志执拗地要求到延安去，不愿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恩来同志针对这种思想情绪恳切地阐明：“张发奎司令部这个据点，是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打进去不容易，撤出来倒很容易，撤出来后要再进去，就更不容易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据点，要坚持下去。”接着，又很风趣地说：“你们想到延安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延安是革命圣地

嘛！但是延安的小米不多，你们进抗大、进党校学习三几个月还得出来。”这样一来，就把大家完全说服了。张发奎到达武汉后，即调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原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相应地改为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我们的党组织亦改为中共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特支书记由刘田夫同志担任，我则主管全面。

一九三九年元旦，战地服务队随同张发奎到达广东韶关。这时张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他知道我们一定不肯将战地服务队归并战区政治部，而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办，故征得我们的同意，将战地服务队的同志分配在战区长官部工作，我们的党组织也相应地改为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我们特支自成立以来，都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管的，而与所在地区地方党委没有建立过组织关系。但到广东韶关不久，周恩来同志却要李克农同志介绍我们和张文彬同志建立组织关系，并由我负责和他直接联系。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对文彬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在德才两方面，都是充分信任和非常器重的。我和文彬同志接头的地点，最初是在古大存同志家。古老当时系省委统战部长，来往人多，为了严格保密，后来就改在金阳、小周同志住处。文彬同志和我大约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分析形势，交流情况，商谈工

作，研究问题。此时，我已调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住在长官部里面。文彬同志因工作问题，曾先后到我的住处四次，我鉴于这里是国民党华南地区的高级军事机关，他深入虎穴，我总觉得缺乏安全感，但他却说：“你这里警卫森严，又没有人认识我，反而保险，不会出什么事的。”乍看起来，他似乎有点冒险，实际上，他是胆大心细、勇而有谋的。

文彬同志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及：张发奎在北伐时任第四军军长，曾与我党密切合作，特别是叶挺同志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血战汀泗桥、贺胜关，攻克武昌城诸役，威震中原，第四军曾由此荣获“铁军”称号。张发奎是尝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甜头的。恩来同志要你们坚持在张部工作，是从历史实际和现实情况考虑决定的。这是一步很好的棋子，要珍惜它，把它下活。

当时，广东地区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中尤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势力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最为突出。孙科系统（亦称太子派）钟天心等与余密切结合，标榜民主团结抗战，企图靠拢进步势力，共同遏止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透、增长，以巩固他们在广东的实力地位。一

九三八年夏，余汉谋任第四战区（辖广东）司令长官时，即成立政治部，由其亲信李煦寰任主任，左恭（钟天心的妹夫，当时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解放后恢复党籍）任主任秘书，并邀请中山大学著名进步教授尚仲衣任战区政治部主管军内外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三组组长。文彬同志和省委因势利导，遂决定调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同志到第三组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司令长官、余汉谋改任副司令长官时，原战区政治部负责人和第三组主要成员根本没有变动。我们在四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同志根据文彬同志的部署，与战区政治部左恭、尚仲衣、钟敬文、石辟澜……等同志密切合作，在广大军民和青年中，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四战区政治部这个机构，国民党中央势力是梦寐以求地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作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投降、分裂、倒退的反革命阵地，决不肯让他人自己的“卧榻之侧”“鼾睡”。果然，为时不久，余汉谋等即在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压力下妥协退让，战区政治部的领导换上了复兴社（亦即军统）的人。文彬同志和省委鉴于客观情势的变化，为保存力量，转移阵地，继续作战，遂将原派往四战区政治部工作的同志及时撤出。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文彬同志说，原先有人主张广东搬用北平“民先”的牌子，搞个“民先”，他不赞成。因为一来“民先”比较“红”，难以顺利发展，二来它不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在本地广大青年中缺乏亲切感和号召力，所以他主张还是搞“抗先”好。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到韶关不久，文彬同志就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敦促张大力维护和支持“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和进步事业。我们根据文彬同志的指示精神和“抗先”总队的要求，建议张发奎以他自己的名义颁赠“抗先”总队队旗一面，并由张亲手批示由我代表他到“抗先”授旗和讲话。以后他自己也到“抗先”去作过关于坚持团结抗战的讲话，并表示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给“抗先”和其他救亡团体以支持。这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肆意压制进步组织和进步事业，破坏民主、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起到了一定的遏止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韶关基督教青年会在进步人士李章达、张文的推动下，举办了一个时事讲座。文彬同志要我去作一次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讲演。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发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平江惨案，为投降、分裂作准备的严重危机时刻。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

破坏，我请文彬同志考虑要不要先向张发奎 打个招呼，是先奏后斩还是先斩后奏或斩而 不奏？文彬同志沉思片刻后即说：张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与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与依附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战区政治部主任丘誉（罗卓英亲信，陈诚系统中人）、国民党广东省三青团书记长高信（中统分子）等也有矛盾，我去讲演可得到张的支持，故应先奏后斩，即先报告张，要张点头；同时搞个讲话提纲给张审阅，征得张的同意。这样，既表示了对张的尊重，又可由此取得合法地位，把“尚方宝剑”拿到手。这次讲座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个上午举行，听讲的人特别多。我从爱护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改弦易辙、团结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这一良好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抗战，违背孙总理遗教种种劣迹，吁请各界爱国人士敦促国民党政府开放民主，实施宪政，保障民权，改善民生，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这次讲话，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和拥护。但当时担任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却暗中派《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就在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指名道姓地攻击我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等等。我随即和文彬同志研究对策。文彬同志高瞻远瞩，沉着机

敏，断然指出：“张发奎会给他们好看的，我们不要和这班家伙打笔墨官司。”果然不出所料。不数日，由战区长官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如期举行，张发奎吩咐我不要随同他去参加。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张指着丘誉的鼻子训斥说：“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话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丘誉木然肃立，连声称是、认错。随后，丘即将《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撤职，并向我当面陪礼道歉。至此，我们即“适可而止”。这是在文彬同志的部署下，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威信扫地了。丘本人也灰溜溜地调离了战区政治部。

重庆《新华日报》因国民党严加封锁、限制，能够在华南地区发行的数量极其有限。文彬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必需与可能，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南》半月刊，并以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大搞“五湖四海”，邀请各方面的有关人士担任《新华南》发起人、赞助人、特约撰稿人和编委等，他们中间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中间分子，也有中间偏右的人物。特别是四战区长官部的高级文武官员被邀请

者尤多。由于工作需要，文彬同志也要我挂了一个名。而实际上在《新华南》负责的是石辟澜、何家槐、李筱峰、邓重行、谭天度、钟远藩等同志。他们殚精竭虑，组稿、撰稿、改稿、编印、发行，在文彬同志和省委领导下，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排除各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把《新华南》办成华南人民的指路明灯。从一九三九年春创刊至一九四二年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坚持出版了三年，它在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孤立反共顽固派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影响所及，不仅在广东，而且扩展到西南各省乃至东南亚各国爱国侨胞。

与此同时，我们还和抗敌演剧一队（后改为四队）一起，根据文彬同志的指示，密切地联系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朱家骅的亲信，但要求进步，靠拢我们，后来参加了我党）及其助手潘允中、侯达、谢汉曾等，很好地团结了四战区大批进步人士，争取了大批中间分子，孤立和打击了反共顽固派，支持了各种进步组织和进步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文彬同志是在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八·一三”事变后，南来广东，受任于民族危难之际，奉命于抗日救亡之时，对于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更是坚持不懈。我到韶

关不久，他就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结合当时广东的具体情况，向我反复阐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迫切性，指出，当前领导人民抗日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召开的省党代表会议、成立广东省委时，他就提出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党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并决定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请求党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加强对广东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此后，他还多次通过党的会议，特别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并确定了今后广东党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会议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在文彬同志和广东省委领导下，在对国民党当局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相继建立，并以此为基点，坚持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打开了东江、琼崖和其他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

文彬同志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求我们特支尽可能抽调一些同志到各江去，利用战区长官部的名义采取合法的方式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

合，开展工作。我们调张敬仁、杨野明同志到东江，张先后出任东江第四、三游击挺进纵队政训室副主任、主任；麦新、时玳、朱河康等同志分别调往西江、北江工作。接着，田夫同志正式撤离战区长官部，调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中共四战区特委书记则改由孙慎同志担任。九月又经张发奎同意，由何家槐、孙慎、黄河天、杨应彬、张明之、郑黎亚等十一人组织一个小型工作队，开赴惠阳前线工作。他们分别在香港、古竹、惠阳等地与梁广、饶彰风、李健行等同志取得联系，与地方党组织有关同志李一之、黄木芬、卓炯、张凤楼等密切配合，并在张文、左恭的支持下，在广大军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等宣传动员工作，积极组织民众，训练干部，支持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活动。

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旬，恩来同志派李亚群同志来柳州（按：第四战区已迁去柳州）告知我南委被破坏，有人叛变，文彬同志被捕。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文彬同志在国民党法西斯监狱中被折磨致死。

文彬同志！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你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发奎将军关心家乡的二、三事

墨 川

原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广东始兴清化彩岭村人。

彩岭村这个小山冲张姓有七、八十户人家。民国年代，人民生活贫苦，文化落后。张发奎将军（家乡称向华将军或张长官）为了改变家乡落后的文化面貌，私人献资，委派始兴知名爱国人士张光第先生等人，到彩岭村筹建学校。初期，张将军以他已故父亲张竹溪的名字，定校名为“私立竹溪小学”，不久，又以纪念唐代丞相张九龄，改为“私立风度小学”，张将军亲自兼任校董事会董事长。1944年夏，为解决风度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困难（当时始兴仅有一所中学，离彩岭村一百多华里），在风度小学增设了一个初中班，定为始兴二中。由于设置了中学班，故将风度小学改为“私立风度学校”。



这是张发奎将军当年筹建的风度小学的正门。



这是风度小学的侧面。

风度大多数学生出身于贫苦人家,为此,学校免收学生的学费和书杂费,校医务室给生病的学生免费诊治,每年学校免费发给每个学生一套衣服(叫

校服），每周免费给每个学生伙食加半斤猪肉，对个别特别贫苦的优等生，可享受工读生的待遇，连伙食费都免收。

张将军很关心家乡办学，除新建风度小学校舍由他捐资外，学校平时正常开支的经费均由他按时拨款，还给学校购置了数量可观的田和山作为校产，以收租弥补学校经费的不敷。学校定期向张将军汇报工作，他也不时给学校写信，过问教学工作。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张将军在军务繁忙中曾三次偕夫人刘景容女士回家乡，亲自视察学校，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深受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为解决彩岭村村民和风度学生行路和洗澡难的



这是张发奎将军修建的水泥钢筋温泉室，正面书有“向华泉”

问题，张将军又资助村中建造了两座水泥钢筋人行桥（一座“竹溪桥”，一座“彩岭桥”）和两间男女分别用的温泉室（叫“向华泉”），还修建了一些难行道路。

由于张将军亲任风度学校董事长，尤其是有中共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加上学校的校长、主任和教职员，大多数又是有理想、有抱负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其中许多教师是地下党员或“青年抗日同盟会”盟员），他们对全赓靖作词、音乐家孙慎谱曲的风度小学校歌“……，我们要实现向华将军的希望，更不要忘记打日本的决心；为故乡文化开辟一条新道路，为民族解放建立一支生力军。风度！风度！随着时代前进！”作为风度学校的教学指导思想，能管善教，因此，教学质量高，校风好，学生勤学奋进，把风度小学办得较为出色，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盛誉，故吸引了始兴、南雄、翁源、曲江、连平等地的大批青少年远途投奔风度就读。

1938年冬广州沦陷后，粤北形势日趋紧张。为了保家卫校，学校请求张将军拨给武器组织保家卫校的抗日武装。张将军很关心家乡和风度小学的安全，给学校拨了一批武器（计：重机枪两挺，冲锋枪十支，手枪十余支，步枪二百多支，子弹数万发，手榴弹一百多颗）和一批军用物资。学校便把部分师生和农村青壮年组织起了保家卫校的抗日自卫